

贸易保护成本及估计方法研究的最新动态^{*}

许统生 聂红隆

摘要：关于贸易保护成本的内容、估计的模型及方法，长期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日渐成熟。标准教科书的贸易保护成本只涉及了进口品与国产品同质条件下配置效率损失。即便是配置效率损失，也不止这一内容，更何况除了配置效率损失的静态成本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动态成本。很难找到一个分析框架能够完整估计贸易保护的全部成本。对西方贸易保护成本文献进行跟踪研究，有利于我们借鉴其分析框架和估计方法。然而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我们在估计中国贸易保护成本时，一方面应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一定要立足中国实情。

关键词：保护成本 成本种类 估计方法

近年来，度量贸易保护成本主要从静态成本和动态成本两个方面进行。静态方面主要包括“大国”与“小国”配置效率的损失、内部外部规模经济条件下配置效率的损失；动态成本主要包括贸易保护阻碍技术进步和降低要素生产率、阻碍某些新产品引进、X-无效率、走私、寻租、行政管理成本等方面。

一、贸易保护的静态成本

(一)“大国”和“小国”贸易保护成本的配置效率损失

“小国”征收从价税(t)所导致的贸易保护成本，即配置效率损失的度量公式为：

$$\text{贸易保护成本} = \frac{v\eta}{2} \left(\frac{t}{1+t} \right)^2 \dots\dots\dots (1)$$

其中 v 是征收关税条件下以国内价格计算的进口额， η 是由贸易保护均衡到自由贸易均衡进口需求弧弹性的绝对值， t 是从价税率。其几何意义是根据传统的“小国”征收关税福利效应的两个福利三角形损失。

如果假设所有可进口品都征收“统一关税”(uniformtariff)，并且这些商品的进口弧弹性也是，可以得到这种贸易保护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即：

$$\frac{\text{贸易保护成本}}{\text{GNP}} = \frac{\alpha\eta}{2} \left(\frac{t}{1+t} \right)^2 \dots\dots\dots (2)$$

其中 α 表示征收“统一进口关税”均衡时进口占 GNP 的比重， η 、 t 的意义同式(1)。

由于 α 通常小于 1， η 一般小于 2， $(t/(1+t))^2$

是一个小于 1 的数的平方，因此，根据(2)式算出的保护成本占 GNP 的比例一般都很小，尤其是当初征收的关税很低时。

公式(1)、(2)最初来源于 Johnson(1960)发表的一篇论文《保护成本和科学关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很多学者基于这一研究成果，利用公式(1)和(2)，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贸易保护成本进行了经验估计，结果都发现：贸易保护成本占该国 GNP 的比例都小于 1%。后来又有很多学者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Harris(1984)指出：“传统的依据公式(1)、(2)计算的贸易保护成本都很小，通常占 GNP 的 0.5% ~ 2%。这个结果几乎对所有代表性的基于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竞争性新古典模型的研究都是如此。”

在应用公式(2)时，许多学者如 Irwin(2001)等都利用了从其他信息资源得到进口需求弹性的估计值，且这一估计值独立于关税水平或进口量。当关税很高时，进口与 GNP 比值就很低。例如，若初始关税接近于禁止性关税时， $\alpha=0$ ，这样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的保护成本就为零。显然这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仅当初始关税很低时，利用公式(2)计算贸易保护成本才比较合理。如果初始关税很高，最好的办法是计算福利三角形区域面积。

在计算“小国”贸易保护的配置效率成本时，还要考虑进口品和国产品是否完全同质，否则就不能运用公式(1)或(2)。如果进口品和国产品不完全同

^{*} 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贸易保护成本估计的理论模型、经验分析、政策选择》(NCET-04-0619)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3BJY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质,很多学者则运用可计算的局部均衡模型(CPE)。简言之,该模型假设:(1)进口品和国产品不完全替代;(2)所有市场完全竞争;(3)进口品供给曲线为水平线,即完全富有弹性;(4)国内供给线向上倾斜,并建立了关键的四个方程。利用这一模型估计贸易保护的静态配置效率成本的文献主要有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日本(Szanami等,1994)、韩国(Kim, 1996)、欧盟(Meserlin等,1996)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对各自国家的经验分析,它们都是估计进口数量限制或关税等贸易壁垒所造成的配置效率成本,其中:Hufbauer与Elliott(1994)利用该模型(CPE)重点估计了美国1990年21个高保护程度行业的配置效率成本,发现总的成本使美国消费者损失约700亿美元,所研究的21个行业的贸易保护成本(配置效率损失)为320亿美元,其中最突出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保护成本就占240亿美元。对就业影响的估计也是福利效应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发现,如果实行贸易自由化,就有190000工人要失业,约为总就业量的0.2%。由此可以推出,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增加一个劳动者就业,消费者需要支付的成本为170000美元,远高于其平均工资。

当贸易保护的政策工具是配额(关税),并且该国是“大国”时,许多学者运用的“小国”条件下计算的贸易成本(配置效率损失)将被低估。因为在“大国”情况下,实施配额(关税)的国家和接受配额(关税)的国家都产生了价格扭曲。

Feenstra(1992)以配额为例用图1说明这一思想,MM表示本国进口需求曲线,它是需求曲线减去供给曲线得到的。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进口量为 OM_W 。在“小国”条件下, OM_q 的配额量产生面积SRN的效率损失。但在“大国”条件下,这个区域面积低估了贸易保护成本。这种情况下,配额导致外国价格偏离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世界价格。EE而不是 $P_W P_W$ 表示外国出口供给曲线, P_W 为自由贸易条件下本国和外国的价格。但在配额 OM_q 条件下,本国价格提高到 P ,而外国价格下降至 P^* ,这就产生了一个额外的效率损失即区域RNG的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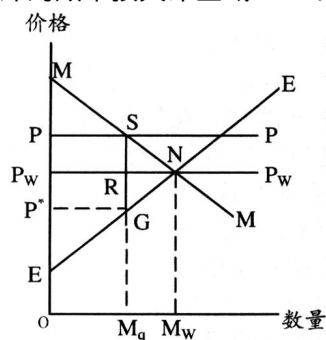


图1 “大国”使用配额贸易保护成本的传统分析

(二)内部外部规模经济条件下的配置效率损失

Panagrariy(2002)指出,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即使贸易壁垒很低,这种贸易保护的配置成本也可能

很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贸易产生了两个额外的利益:因市场规模增加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产品种类的增加。假设有两种商品:商品1和商品2,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两种商品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 $x_i = L_i^k, 1 < k < +\infty, i=1,2$ 。规模经济是厂商外部规模经济,因此均衡是平均成本定价均衡。效用函数设为 $C_1 C_2$,在自给自足状态下,每个部门利用总劳动的一半即 $\frac{L}{2}$,生产和消费产品的数量均为 $(\frac{L}{2})^k$ 。开展贸易使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每个国家对每种产品的消费量增加到 $\frac{L^k}{2}$,因此,实际收入增加的百分比是 $(\frac{L^k}{2}) / (\frac{L}{2})^k - 1 = 2^{k-1} - 1$ 。若 $k=2$,我们可以说从封闭经济状态到自由贸易的利益使每个国家的实际收入增加了100%。

对该模型稍作修改就可以说明贸易还能产生使产品种类增加的贸易利益。由于保护产品之间的对称性,假设效用函数是不变的替代弹性的形式,并且替代弹性大于1。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状态的均衡可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两国完全专业化生产这两种产品的一种。当两国自由贸易时,每个国家仍只生产一种产品但消费两种产品。贸易利益来源于产品种类的增加。

图2可以说明这种情况。自给自足状态可能到达最高的无差异曲线 IC_1 在两轴上分别与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相交。假设按平均成本定价,该经济体生产两种产品中的一种。在自由贸易状态下,每个国家能生产一种产品;消费两种产品。对替代弹性等于 $\sigma(\sigma > 1)$ 的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每个国家收入增加的比例是 $2^{(\sigma-1)/\sigma}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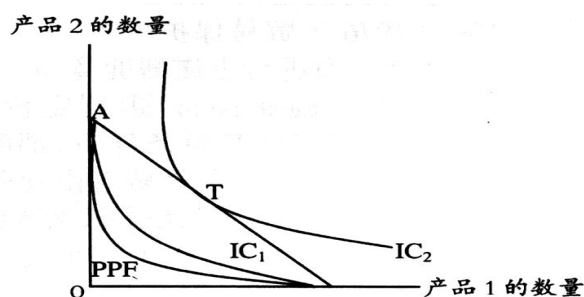


图2 外部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利益:产品种类增加

以上分析的规模经济是外部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利益(保护成本)。在规模经济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利益,可以用Krugmar(1979)模型来说明。内部规模经济、要素及产品市场的均衡分别用下式表示:

$$l_i = \alpha + \beta x_i \quad \alpha > 0 \quad \beta > 0 \quad \dots\dots\dots (3)$$

$$L = \sum l_i = \sum (\alpha + \beta x_i) \quad \dots\dots\dots (4)$$

$$LC_i = x_i \quad \dots\dots\dots (5)$$

x_i 是企业 i (产品 i)的产出, L 是社会总劳动(总

人口), C_i 是每个人对产品 i 的消费。垄断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

$$\frac{p_i}{w} = \frac{\beta \varepsilon(C)}{\varepsilon(C) - 1} \dots\dots\dots (6)$$

其中 w 是工资率, p_i 是产品 i 的价格, $\varepsilon(C)$ 是产品 i 的需求价格弹性, 且 $d\varepsilon/dC < 0$ 。

垄断竞争厂商长期均衡的条件是长期利润为零, 即总收益等于总支出。根据这一条件并经过化简得到:

$$\frac{p_i}{w} = \frac{\alpha}{LC_i} + \beta \dots\dots\dots (7)$$

解出 (7)、(6) 式可求出每种产品的均衡价格 (p/w) 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需求量 (C^*), 继而可求出每个产品产量 (x_i) 及该经济产品种类等于总劳动除以厂商的劳动投入, 即:

$$n = \frac{1}{\frac{\alpha}{L} + \beta C} \dots\dots\dots (8)$$

如果两国开展自由贸易, 可消费商品的种类数增至为:

$$n' = \frac{1}{\frac{\alpha}{L+L^*} + \beta C'} \dots\dots\dots (9)$$

其中 L^* 为外国的总劳动力数量, $C' < C$, 显然 $n' > n$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内部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垄断竞争厂商, 通过开展贸易获得规模经济, 降低产品价格; 同时消费者消费的产品种类也增加了。这就是超脱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利益(保护成本)。

在厂商内部规模经济 and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Harris(1984) 假设加拿大是“准小国”(almost small country), 即它是进口品的价格接受者和出口品价格的制定者, 以一般均衡模型的“校准”(calibration) 方法, 估计了加拿大 1976 年贸易保护成本。他分析厂商两种行为: 一种是厂商进行古诺博弈竞争, 另一种是在某个合适“聚点”(focal point) 进行定价串谋。Harris 研究发现: 在传统完全竞争条件下, 消除加拿大关税不会增加福利, 这是因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增加被与之相伴而生的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损失所抵销了; 而在内部规模经济 and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即使考虑贸易条件恶化的不利效应, 消除加拿大关税会至少增加 4.1%GNP 的福利。

二、贸易保护的动态成本

(一) 阻碍技术进步, 降低要素生产率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是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角度进行说明的。Keller(2004) 指出, 贸易对国际技术扩散十分重要, 而后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进口贸易可以通过引进制度, 节省制度创新成本。通过“干中学”效应和“外溢”效应迫使国内企业进行制度创新, 以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 从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创性地将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所

解释的残差部分, 包括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及要素效率的提高等因素归结为全要素产生的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以 Romer, Lucas 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 并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依赖于其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提高。Coe 和 Helpman(1995) 首次从实证角度考察进口贸易如何影响一国技术进步, 他们对 21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以及以色列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贸易伙伴国研发 (R&D) 投入有助于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本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Edward(1998) 利用 93 个国家 1971-1990 年面板数据分析贸易自由化对 TFP 的影响, 为避免贸易自由化指标选取的不同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 他在计量回归中分别采用了 9 种贸易自由化度量指标, 计算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可以有效提高 TFP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Ferreira 等 (2006) 对几个中等收入国家研究发现: 有些高关税率的中等收入国家, 贸易保护对 TFP 影响是显著的, 有些国家 TFP 损失的 1/3 可以归因于贸易保护, 且贸易保护对人均 GDP 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在内生增长的动态分析框架下,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 贸易保护成本更多地体现在长期动态效应和抑制创新活动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效应的损失 (Romer1994), 并且这些成本远大于资源配置扭曲的静态效应。这些效应采用一般均衡方法是很难估计的。有的研究成果还从贸易自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率、就业、环境等指标的影响来衡量贸易保护的动态成本, 因为这些指标不仅综合了各动态效应的影响, 而且可以计量分析。但这些因素的变动都可以看做上述各种动态和静态效应作用的结果。

从现有的经验估计结果来看, 无论是“大国”, 还是“小国”, 如果仅仅从配置效率损失方面去估计贸易成本, 这种贸易保护成本的数量都有是很小的。例如, 即使 Feentra(1992) 考虑的是“大国”情况, 发现美国 1985 年的贸易保护成本也仅占美国 GDP 的 0.38% ~ 0.73%, Hufbauer 和 Elliot(1994) 估计的结果也很小。Melo 和 Tarr(1990) 认为, 这种估计的贸易保护成本之所以很小, 主要是因为这些学者利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模型。在局部均衡模型中, 各部门的保护成本是分别独立给予估计的, 没有考虑跨部门的效果, 然后就对这些独立计算的成本简单加总就得到总的贸易保护成本。如果利用考虑各部门相互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 贸易保护的福利成本(配置效率损失) 将会有较大增加。但一般均衡模型要求政策及数据信息要求非常庞大, 且不容易获得。利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可以克服这一缺点, 也是国际贸易比较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既可以估计一国实行贸易保护使该国进口减少的数量, 也可以估计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使该国出口减少的数量, 从而得到有关保护成本的数量。Pardos(2005) 用

这种方法估计了全世界 113 个国家 1970-2000 年贸易保护成本,并讨论了贸易政策指数的取舍和计算问题。运用“引力模型”估计保护成本主要基于贸易政策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由于各国实行各自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经济体间的引力削弱,从而引起贸易流量减少。

(二) 阻碍新产品的引进

典型的经济模型都假定:贸易保护政策并不会影响该国可获得的商品集,一国进口商品集不受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这样条件下估计的关税造成的效率损失比较小。Romer(1994)指出,如果放松这个假设条件并假定贸易可以给进口国带来新的商品,特别是中间投入品,则进口国征收进口关税所导致的国民收入损失比例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征收关税的两倍。其中心思想是:如果某类新产品进入该国市场需要一笔固定成本和不变的边际成本,并且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能够在该国市场上销售一定数量的这种产品,那么,即使征收较低的关税,也能使这种产品在该国市场上消失,整个消费者剩余损失。最终说明基于进口商品集不变基础上的传统模型充分低估了贸易保护成本。

Romer建立了一个模型:进口国家消费一种商品,该商品是用劳动和进口异质投入品两种要素生产得到的,可得到进口品的数量越多,生产成本就越低。Romer假设劳动和投入品份额相同,采用模拟(simulation)的方法对以下两种情况进行模拟:一是固定自由贸易条件下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数量,二是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数量会随着关税变化而变化。结果发现:11%的关税在第一种情况下降低了1%的实际收入,在第二种情况下降低了19.81%的实际收入。这说明,即使关税很低,但由于部分投入品的消失,也会给该国造成巨大的损失。

Marrewijk等(2006)将Romer(1994)模型一般化和动态化,他们在Romer的产出函数中引入时间变量将其动态化并构造了社会福利函数,推演出了政府收入函数,模拟分析了一个发展中小国的贸易保护成本,证明了全部资本品依靠进口的发展中小国经济,由于贸易保护产生的动态福利损失大于静态福利损失。Marrewijk等(2006)论述了贸易自由化通过扩大市场和可利用的中间产品的范围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认为资本品只能依靠进口的发展中小国经济逐渐形成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收入、福利、引进资本品的份额会随贸易保护减少而增加。由于新发明商品的引进存在一个高昂的固定成本,只有当引进该资本品的预期利润现值高于固定成本时,新商品才被引进。因此增长路径的调整是非对称的:贸易保护增加将减慢经济增长,贸易保护减少将因更多新产品引进而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一个快速赶超的过程。只有当贸易保护改变进口资本品的份额时,贸易保护的静态成本才会小于动态成本。他们对朝鲜等国的实证分析表明:朝鲜20世纪50年代较少的贸易保护带来了高人均产出和高经济增

长率,80年代的封闭使新产品和中间服务不能进入朝鲜而造成经济增长降低到零,人均收入增长也陷于停滞;而开始落后于朝鲜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却由于开放和新产品引进走上了一条快速赶超的增长路径,人均产出达到与美国相近水平。

(三) 产生 X- 效率

仅仅从配置效率角度分析得出的因扭曲导致的成本一般被认为是低估了真正的扭曲成本。针对于此,Leibenstein(1966)指出,如果配置的扭曲减少厂商内部的效率,那么,贸易保护就会产生比传统配置效率损失更大的成本。Corden(1974)认为,将X-效率考虑到贸易保护成本中去,结果更复杂。贸易自由化导致国内进口厂商获利性减少,增加了经理的努力程度,因此提高了进口竞争部门的X-效率,但也减少了出口部门经理的努力和X-效率,所以,使得整个经济的福利是不确定的。

从经验分析看,Balassa(1971)和Bergsman(1974)把X-效率造成的损失纳入到贸易保护估计中,发现这种贸易保护成本比传统计算方法得到的成本大得多,Balassa也把这些成本称为动态效应。他们在一个局部均衡框架和生产成本不变的假设条件下,把与进口竞争的部门分为两类:传统部门(如纺织品、服装部门)以及现代部门(如消费耐用品部门),前者能从自由贸易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后者则在自由贸易的激烈竞争中被淘汰。传统部门的高国内成本等价于X无效率,现代部门的高国内成本等价于配置无效率。Bergsman估计了1966年巴西X-效率占其GNP的比例高达6.8%,而传统方法估计的成本即配置效率损失仅占其GNP的0.3%。

Bergsman(1974)利用图3说明其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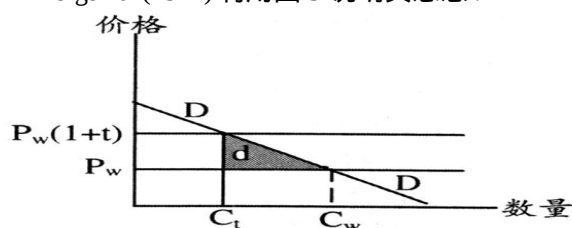


图3 贸易保护成本: X-效率

图中DD表示与进口竞争产品的需求曲线, P_w 为世界价格, t 是从价税。在贸易保护条件下,国内生产的边际成本假设是常数 $P_w(1+t)$ 。如果产品是传统部门的产品,取消关税后,X-效率假定完全按每单位初始贸易保护数量增加,得到 tP_wC_t 生产方面和三角形d消费方面的净利益。如果产品为现代部门产品,则取消关税后不会增加X-效率,该产业消失,资源在其他部门之间配置。生产方面的利益 tP_wC_t 是作为资源配置效应。更大的X-效率的关键是传统部门具有更高的保护程度和更大的产值。

(四) 导致走私

广义上讲,一切私自携带货物出入境,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均属走私。走私对财政收入及收入再分配产生不良影响。从对征收进口关税的福利效应的

分析中可以得知,只要关税税率没有达到完全阻止外国商品进口的程度,征收进口关税将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当这部分收入为政府所有时,政府可以对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但当落入走私分子之手时,则形成了非法收入,不再进入社会再分配渠道。

走私会极大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而走私进口的物品在市场上销售,其价格相对于正常进口的商品要低得多,这必然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另外,走私物品在质量上也缺乏保障,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将国内货物、物品走私出境,还会严重损害其他外贸经营者的正当权益,影响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破坏对外贸易秩序。

即便是走私能给走私企业本身带来巨大的非法利益,但这也并非意味着走私对它们自身没有危害。由于走私本身的投机性质,具有巨大风险,这使得企业在制订经营战略方面容易产生短视行为,不再谋求价值链的前后扩展以及品牌商誉等长期发展所必需的战略资源的建设,而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企业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此外,走私还会危害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假若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其技术优势,而技术优势的形成和保持是需要日积月累的,还需要不断加大投入,不断研究开发,才能保持技术方面的领先。但当一企业发现其可以通过走私即可获得大量收益时,往往会放弃对技术方面的重视,于是,技术优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失去。

关于贸易保护引起走私活动的实证分析方面,Ades 和 DiTella (1999) 利用跨国数据分析得出贸易限制与寻租、腐败行为存在十分显著的联系。Grais 等(1986)把土耳其进口配额措施引起的寻租成本引入一般均衡模型,模拟计算出取消配额限制将使土耳其 1978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6.3%,比传统方法计算的结果高 1%~2%。

(五) 导致寻租成本

由于考虑到寻租活动的最初直接产出为零,即寻租活动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和劳务,也不生产投入这些产品与劳务的投入品,所以著名国际贸易问题专家 Bhagwati 坚持使用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DUP)这个概念来涵盖并取代寻租概念。按照 DUP 活动的定义,寻租活动不仅包括了诸如抢劫、偷窃和战争等这样一些非法的或不人道的活动,它同时还包括那些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并且,从公共选择理论看来,后者才是寻租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Bhagwati 还区分了下游 DUP 行为(如在既定扭曲条件情形下发生的寻租、寻利行为以及逃避关税和配额的行为等)和上游 DUP 行为(如寻求立法征税和设置进口配额的创造扭曲的行为)。他提出在

估量贸易保护成本时应该只有下游 DUP 行为才被考虑到,因为上游 DUP 行为只是贸易保护的原因,而不是贸易保护的结果。根据 Bhagwati 提出的按照获得收入的途径不同对 DUP 活动类型的划分,可以将寻租分为以下三种:(1)寻求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好处的院外游说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是要通过改变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以及要素收入以获取收益;(2)寻求收入好处的院外游说活动,把政府收入导向对自己有利的使用方向,从中获得利益;(3)寻求垄断利益的院外游说活动,这种活动的目标是创立一种人为产生租金那样性质的垄断,逃避关税,或者进行走私,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往往同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会同时导致这三种寻租的出现,例如在进口配额中,寻租者会以游说、流通等活动说服政府对某一产品实施进口配额,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属于第三种寻租;当进口配额已经设置,寻租者无力通过法律途径将其消除时,各进口商又会想尽办法,如游说、疏通、走后门等方式,以保证自己能获取这些进口配额,这属于第一种寻租;寻租竞争还会出现于政府官员(部门)之间,由于在第一种寻租中经常会使政府官员(部门)获得特殊利益,政府官员(部门)之间又会为配额数量的决策权、执行权等相关管制权力的获得而展开竞争,这属于第二种寻租。

贸易保护中寻租活动有很多危害。寻租会导致市场竞争格局的混乱。假设国内企业进口商品需要获得进口许可证才能从事进口贸易,如果许可证是以拍卖形式发放,则出价最高的企业获得进口许可证,资源配置得到合理配置。但寻租活动的存在使得拍卖失效,真正获得许可证的并不是那些对进口商品出价最高的企业,而是在寻租活动中做得最好的企业,资源并没有配置到最需要资源的地方去。这就是说,市场中比较差的企业反而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资源,市场竞争会受到损害。寻租还容易形成垄断,从而影响市场结构,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寻租会导致政府收入下降。以关税为例,寻租者会想尽办法逃脱关税,这时,海关关员会获得一部分特殊利益,但受损的却是政府。寻租活动有可能使得贸易保护偏离原有目标。贸易保护一般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有其具体目标,并且一般在目标实现后就会放弃贸易保护。但寻租活动使得寻租者与政府部分官员(部门)的个体利益压倒了公共利益,从而把贸易保护引向危险的方向。

对 DUP 活动的福利效应分析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但必须注意:首先,寻求额外收益的活动的福利效果是不确定的。比如在配额限制的例子中,社会福利无疑是净损失,但对于走私活动来说,如果走私的成本小于因逃避关税而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社会福利反而会提高,它说明非法的 DUP 活动有可能会提高福利,Bhagwati 和 Hansen(1973)提出的一个有趣的模型验证了这一结论。其次,对于鼓励创造额外收益的活动,福利水平一般是下降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零关税的游说结果,寻租方和避

租方势均力敌,投入大量资源却最终没能改变关税税率,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降低,这实际上就是Magee-Brock-Young(1989)模型中所说的“黑洞”现象。

(六)增加行政管理成本

为进行贸易保护,需要多部门的多方协作。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机构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这必然给贸易保护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以海关总署为例,根据2004年国家审计署对政府各部门的审计报告,2003年初,财政部批复海关总署2003年预算支出75.09亿元,年内追加3.7亿元,全年支出预算78.79亿元。海关总署2003年决算报表反映,全国海关系统上年结余40.28亿元,当年各项经费收入87.05亿元,支出84.74亿元,结余分配5.4亿元,年末结余37.18亿元,其中:海关总署本级结余18.62亿元。

三、评价及启示

(一)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贸易保护成本远不止一般教科书所指的福利三角形损失,这为我们科学度量这种成本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但现有度量保护成本的研究也有以下缺陷:

1. 度量成本种类的单一性。贸易保护成本至少包括以上8种,但现有的文献研究都只涉及其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没有任何一篇文献系统地度量了保护成本的全部内容。

2. 考虑保护政策工具的单一性。现有文献考虑度量保护成本时基本上是以征收进口关税或实施配额为例来分析,但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工具非常多,除了关税和配额之外,出口补贴、技术及卫生标准、外汇管制、“自动”出口限制等等也是常见保护政策工具,但基本上没有研究这些工具保护成本的文献,更没有涉及其他非常见政策工具保护成本的文献。

3. 对贸易流向保护成本估计的单一性。任何干预自由贸易的政策都可视为贸易保护,贸易的流向可以分为进出口,任何一国或地区的贸易从长期来看都应进出口大致平衡,也就是说,出口和进口的地位基本相当。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国家对出口都进行了限制或鼓励,发展中国家主要控制其比较稀缺的资源性产品、原材料等产品的出口,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发达国家主要控制其高科技产品、防卫产品出口,鼓励农产品出口。但现有主流文献都是以进口限制为例来研究贸易保护的代价,对出口干预的保护成本没有涉及。

4. 对贸易保护商品种类的单一性。现代国际贸易按商品种类来分,可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其在整个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另一方

面,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对服务贸易给予比较严格的限制,但现有文献都很少对服务贸易保护成本进行估计。

5. 对有关国家研究的单一性。现有的文献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保护成本,而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不够。另外,现有经验研究中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

(二)启示

度量一国保护成本涉及的内容很多,不仅涉及理论模型的选择和建立,而且涉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保护,其中又涉及到相关行业或产品的取舍;不仅涉及进出口保护,还涉及到保护措施的选择。因此,不可能通过某一个模型来估计整个保护成本。在估计中国贸易保护成本时,应根据中国贸易保护的具体措施、保护对象、保护时间等情况,选择最能反映中国实际的理论模型,以尽可能客观地度量保护成本,并提出有关减少这种成本的政策建议,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中国贸易保护成本的估计,作者将在另文作进一步探索。

注释:

许多教科书也是这样说明贸易保护成本的。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中文版,29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四个方程具体表达式见 Hufbauer, G.C. and Elliott, K.A., 1994. "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iie.com>.

http://www.crich.cn/swjy/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2065.

参考文献:

1. Ales, A. and Di Tella, R., 1999. "Rents,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4), pp. 982-993.
2. Bhagwati, J., 1982.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 Activ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 pp. 988-1002.
3. Marrewijk, C.V. and Berden, K., 2006. "On the Static and Dynamic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for Sm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4. Coe, D.T. and Helpman, E., 1995.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 (5), pp. 859-887.
5. Deardorff, A.V. and Stern, R.M., 1981. "A Disaggregated Model of World Production and Trade: an Estimate of the Impact of the Tokyo Roun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 pp. 127-152.
6. Pardos, E. and Carmen, F., 2005. "Alternative Measures for Trade Restrictiveness: A Gravity Approach." Seventh Annual Conference Discussion Paper, 8-10 September,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7. Feenstra, R., 1992. "How Costly is Protection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 (3), Summer, pp. 159-178.
8. Ferreira, P.C. and Luis, J.R., 2001. "New Evidence o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nsaios Econ. da EPGE* 433.
9. Lee, F.C., 1996. "Convergence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pp. 331-335.
10. Hufbauer, G.C. and Elliott, K.A., 1994. "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iie.com>.

11. Irwin, D., 2001. The Welfare Cost of Autarky: Evidence from the Jeffersonian Embargo, 1807-1809. mimeo: Dartmouth College.

12. Melo, J. D. and Tarr, D., 1990. "Welfare Costs of U.S. Quotas in Textiles, Steel and Auto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72, No. 3, pp. 489-497.

13. Keller, W., 2004.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LII, pp. 752-782.

14. Kim, E., 2000.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Korea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rice Protection, Market Power, and Scale Efficien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2 (1), pp. 55-83.

15. Kim, N., 1996. "Measuring the Costs of Visible Protection in Kore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iie.com>.

16. Ferreira, P. C.; Trejos, A. and Vargas, F. G., 2006. "Measuring the TFP Costs of Barriers to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April.

17. Panagariya, A., 2002.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mimeo: University of Maryland, January.

18. Messerlin, P. and Owen, R. F., 1996. "Preliminary Study on Costs of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iie.com>. Yoko.

19. Sazanami, S. U. and Hiroki, K., 1995. "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Japa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iie.com>.

20.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 pp. 469-480.

21. Romer, P., 1994.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3, pp. 5-38.

22. 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July), pp. 3-42.

23. Harris, R., 1984.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ome Estimates for Canad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pp. 115-145.

24. Edwards, S., 1998. "Openness,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at Do We Really Know?" *Economic Journal*, 108, pp. 383-398.

25. Magee, S. P.; Brock, W. A. and Young, L., 1989. *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 Grains, J. W.; Melo, D. and Urata, S., 1986. "A General Equilibrium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s of Reduction in Tariffs and 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 in Turkey in 1978." In T. N. Srinivasan and J. Whalley, eds., *General Equilibrium Trade Policy Model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pp. 61-88.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南昌 330013
(责任编辑: 曾国安、陈永清)

(上接第 122 页) 期待的相反。凯恩斯当时的回答是:倘若真如你说,我会纠正他们。但是,不是活着的凯恩斯,而是他的理论,继续享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段历史小插曲,不仅生动地昭示了观念的重要,而且也正如艾玛·戴维斯所言“拔出一个观念要比拔出一颗牙齿疼痛的多,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剂。”拔出一个观念固然不易,根植一个观念可谓难上加难。回顾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无论是早期的门格尔、庞巴维克,还是米塞斯、哈耶克,抑或当代的罗斯巴德、柯兹纳等人,他们的学说无一不是在同既得利益的“既有观念”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也无一不是忍受着苦寂、排斥、污蔑和打压,本着“道一以贯之”的信念坚守着“观念”阵地,才使得昨天的异端成为今天或明天的信条。

由上述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特色可知,奥派的主要特征是其治学方法的人性化。若要追寻该学派的思想背景,我们可以上溯到 18 世纪苏格兰的几位道德哲学家,如休姆、洛克、亚当·斯密等人,他们的政治经济著作,无不以“人”为中心来论述人的行为规律。哈耶克曾说过:“只是经济学家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若不能摆脱自视高贵的学科歧视的束缚和画地为牢的桎梏,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能力就会继续深受戕害。奥地利经济学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把经济学从狭窄的死胡同中解脱出来,置放在把人当人的社会哲学层面来论述。一切从“人性”的研究开始着手,强调个人、观念、自由、市场、永续发展

等概念范畴,从而对市场经济进行再肯定;并随着对市场机制、经济秩序研究的深入,将经济学的研究,转向政治哲学、人类交往、社会合作等一般程序的研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国际来看,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已成为普世价值;就国内而言,“以人为本”、“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在此背景下,深入挖掘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资源,弘扬其精髓要义,不仅是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契机,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注释:

引自米塞斯:《人的行为》,中文版,352 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参阅夏道平:《自由经济学家的思与言》,91~92、59 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

参阅夏道平:《自由经济的思路》,270 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

Hayek, F. A., 1967. "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96-105.

引自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6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原文如下:“One Who is Only an Economist Cannot be a Good Economist.” Hayek, F. A., 1996.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Reprinted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77-91.

(作者单位: 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 武汉 430205
(责任编辑: 刘成奎)